



“中国近现代音乐、音乐人与爱国情怀” 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 静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0 周年,又适逢上海音乐学院建院 90 周年,为铭记历史,接续传统,更深一步了解近现代以来音乐领域的变化和发展,2017 年 4 月 21 日,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了“中国近现代音乐、音乐人与爱国情怀”跨学科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得到了《抗日战争研究》和《社会科学报》两个编辑部的大力支持,汇集了来自全国 19 个单位的 30 多位学者。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林在勇、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辑段钢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词。致词中,林在勇认为,把中国近现代音乐与音乐人这样一个主体,在史学家的视野当中加以历史的关照,并且作为主题予以阐发,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应该是第一次,是音乐界、音乐学、音乐史领域的一件大事。他希望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们,更加关注音乐领域的发展,因为没有一种大的视野、高的境界,想要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能传之久远的好作品是不可能的。熊月之的致词题为“抗日救亡音乐的繁盛与上海城市的集聚效应”,从抗战时期上海音乐人才、音乐机构以及市政格局等几个方面阐释了近现代抗日救亡音乐在上海的产生、传播和城市社会学的解读。高士华在致辞中表示,之所以与上海音乐学院合开这次会议,不仅仅是因为抗日歌曲对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从今天看来,这些抗战歌曲所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是我们建设伟大强国的不竭动力。

本次研讨会为时一天,共四场学术报告,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18 位学者的专题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场学术报告的四个专题发言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再探》(与中华书局王亮合作)、复旦大学夏静的《歌曲、政治与记忆:义勇军进行曲的文化史》、上海社会科学院葛涛的《战时日本在上海的广播事业与使命》以及哈尔滨音乐学院王岩的《沦陷时期哈尔滨放送音乐活动研究》。前两个专题都把焦点放在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一家喻户晓的音乐作品上。苏智良的论文详细考证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探索了《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诞生在上海的原因。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生态;二是民国时期上海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电影业的发达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出现奠定了产业基础;三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救亡运动兴起,多首《义勇军进行曲》被创作出来。夏静的文章从



歌曲的产生、传播和接受以及歌曲与政治的关系两个角度对《义勇军进行曲》进行解读。夏静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把歌词具象化和视觉化,实际上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各种文化资源和象征的符号,人们把《义勇军进行曲》改编成歌剧、舞台剧、话剧等,构建了一种号召全民抗战的社会图景;从歌曲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对《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抗战歌曲进行过宣传,最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其中有着各种因素的考量。葛涛的文章考察了战时日本在上海广播事业的推行状况,认为日本的广播事业是日本政府战时贯彻战争意图的政治性媒介和工具。王岩的文章关注的是沦陷时期哈尔滨的音乐活动情况。哈尔滨是中国最早开始放送广播的城市,文章通过对沦陷时期哈尔滨广播放送的音乐内容变化的考察,指出哈尔滨放送音乐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音乐节目受制于听众和当局政策的约束,体现出多样性和普遍性,并阐述了音乐不能脱离政治、经济、历史、心理、宗教、科学等因素而孤立存在。

第二场学术报告的四个专题发言分别是:上海音乐学院汤亚汀的《上海巴格达犹太社群的音乐视域》、西南交通大学何俊的《近现代留德学人与中国音乐学科的建制》、复旦大学陈玉聃的《“中国”的界定和表达:音乐中的“中国性”》以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曾琳智的《音乐在中国对外传播中的角色》。汤亚汀的论文关注的是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出现的犹太社群,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犹太社群的活动:一是涉及犹太社群的长篇音乐文论;二是白俄犹太社群的音乐生活;三是德奥难民宗教仪式音乐;四是德奥难民的世俗音乐。汤亚汀指出,难民社群多元的生活反映了巴格达犹太人的民族性、宗教性、政治性、精英性以及双重身份的认同。何俊的文章以早期留德的四位音乐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早期的留德知识分子在中西音乐对比、艺术审美、文化救国等方面为中国文化发展所寻求的路径。陈玉聃的文章从国际政治思想史角度对“国家认同”进行了界定,认为抗战时期,面对强大的外敌,我们的民族性被激发出来,在歌唱者和听唱者之间,有了共同的精神象征。曾琳智的文章则通过对主流媒体的研究关注音乐在对外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在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理念存在很大差异的时候,音乐能够扮演关键角色,通过音符来传达文化和交流理念,一场音乐会、一个音乐家有时候会成为一个国家文化品牌的标志。

第三场学术报告的五个专题发言分别是:上海音乐学院肖阳的《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的音乐救国实践看上海音乐学院的爱国主义思想渊源》、上海音乐学院杨赛的《萧友梅的歌曲创作》、复旦大学马建标的《近代中国的军事音乐与国家认同:晚清新军将领陶骏保的音乐创作》、苏州大学岳鹏星的《晚清都市空间的慈善、娱乐与社群认同》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王智新的《音乐与国家认同》。肖阳的文章梳理了上海音乐学院1927—1937年初创十年的音乐救国实践活动,探讨了上海音乐学院爱国主义思想的渊源。杨赛的文章通过对萧友梅歌曲创作思想的梳理,认为萧友梅的歌曲创作志在唤醒民族意识,加强爱国心,主张用浅近的词语、用新韵创作歌曲,其歌曲创作是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建标的文章则以清代陶骏保的音乐创作为个案,关注近代军事音乐的作用和影响,为理解晚清新军和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岳鹏星的文章以上海、北京、天津为中心,探讨了晚清城市空间包括音乐活动在内的慈善义演。他认为,以舞台场地组织者、表演者、市民为主体的慈善义演,触动着阶层的流动,从广义层面上他们也参与了国族重构。王智新的发言通过对近代以来日本军歌的介绍和分析,探讨了作为一个被侵略的民族,我们



应该如何对待这些音乐。

第四场学术报告的五个专题发言分别是：上海音乐学院黄静的《音乐人与上海文艺政治运动的转型：以作曲家陈歌辛为例》、华南师范大学伍春明的《民国上海音乐人的家国情怀与音乐走向》、浙江师范大学杨和平《近现代音乐家与音乐教育——从李叔同说到春峰乐会》、西安音乐学院夏滢洲的《革命外力下陇东音乐文化结构的转型》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的《音乐与政治：抗战中的音乐复兴与民族复兴》。黄静的文章以作曲家陈歌辛音乐创作特征的变化以及命运变迁为例，探讨了音乐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不同政权文艺政策的变动而发生的重大改变。伍春明的文章以民国时期流行音乐人为例，指出音乐人的出身、经济条件以及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音乐路线有着重大的影响。杨和平则从李叔同到春峰乐会切入，梳理了近代音乐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夏滢洲关注的是延安革命文化背景下，陇东音乐文化结构的转型。他认为，在传统民歌、音乐机构转型的过程中，延安音乐文化的象征意义对陇东的音乐文化有遮蔽，但并没有影响其发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陇东音乐文化的成功做法实际上使延安音乐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王续添长期关注音乐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对于抗战时期的音乐与政治研究，他构建了这样的理论框架：一是民族主义话语“音乐复兴”与“民族复兴”的阐释；二是抗战时期音乐复兴的过程、内容以及特点。他认为，音乐复兴的主体是音乐界与民众的结合，大众参与是音乐复兴的基础，主题就是民族主义或者抗日，这是民族复兴的动力；从内涵而言，它是整理旧乐，这表明中国音乐意识的全面觉醒。

本次研讨会的内容涉及了音乐学、历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金光耀、杨和平、王续添、汤亚汀以及来自清华大学的戚学民教授都对研讨内容给予了精彩点评，并对这次研讨会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每个专题讨论前，主办方请本院的老师、学生就一些相关音乐进行展演，迅速地把大家带入音乐产生的时代和情境中，既突出了发言的主题，又展示了音乐学院的特色。

音乐史在我国是一门小众而新型的学科，方兴未艾，音乐史的研究需要音乐界和史学界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共同努力，此次研讨会是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良好尝试，应该坚持下去。

〔作者黄静，上海音乐学院思政教研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高士华）